

红军史

疑难考辨



王健英 著

中共党史出版社

红军史

疑难考辨

王健英 著



中共党史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红军史疑难考辨/王健英著. —北京:中共党史出版社,
2009. 12

ISBN 978-7-5098-0327-1

I. 红… II. 王… III. 中国工农红军—军队史—研究
IV. E297.2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09)第 109169 号

书 名: 红 军 史 疑 难 考 辨

作 者:王健英

责任编辑:韩冬梅

出版发行:中共党史出版社

社 址:北京市海淀区芙蓉里南街 6 号院 1 号楼

邮 编:100080

网 址:www. dscbs. com. cn

经 销:新华书店

印 刷:北京密兴印刷有限公司

开 本:148mm×210mm 1/32

字 数:348 千字

印 张:15

印 数:1—3000 册

版 次:2009 年 12 月第 1 版

印 次:2009 年 12 月第 1 次印刷

ISBN 978-7-5098-0327-1

定 价:32.00 元

此书如有印制质量问题,请与中共党史出版社发行部联系

电话:82517249,82517244

前言

毛泽东指出：“我们党的历史，可以说就是武装斗争的历史。”“武装斗争是中国革命的主要斗争形式。”中国共产党领导中国人民革命战争和加强人民军队建设，走农村包围城市革命道路的历程，成为党在民主革命时期历史的极其重要内容。中国工农红军的创建发展历史，成为土地革命战争时期党史的极其重要组成部分。事实上，许多军史上存在疑难的争议问题，同时也是党史上长期未能深入研究达成共识的问题。

本书是笔者继《红军纪实丛书》（五卷）出版后，十年来新撰写的红军史疑难异议考辨评论的专著。主要包括：中国工农红军创建史深层次疑难问题探讨；中共对军队绝对领导体制创建发展的来龙去脉；农村包围城市革命道路理论的形成；红军长征史深层次难点考析；遵义会议改组中央领导探实；全军《组织沿革》重要史实考辨申明等。这些均是笔者参加总参谋部《历史资料丛书》审稿涉及的党史军史疑难争议问题和出席学术研讨会的论文、发言提纲。

笔者学习从事中共党史教学与研究六十年。作为老兵早已退居二线，之所以继续探讨这类疑难争议问题，完全出自于热爱宣传中共党史、期望党和军队光荣传统作风代代相传的坚信与赤诚，愿意奉献余热，尽心尽力为中青年同行进一步研究铺石垫路，为编撰“真实的党史”提供参考。参与审稿有机会阅读有关历史

文献(包括许多原件),出席学术研讨会有幸听取许多同行勇于探讨的新见解。所著考辨力求言之有据,言之有理。但个人水平与精力有限,纯属一家之言,辑集出版,仅供参考。肯定存在着不足和差错,热切欢迎读者批评指正。

谨以此书献给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六十周年!

王健英

2008年11月22日

目 录

中国工农红军创建史疑难问题考辨	1
论中共对军队绝对领导体制的创建与发展	25
中共对军队绝对领导实现方式的历史演变	41
中共对红军的领导为何不能采用“党团路线”	53
“李文林式”的割据与建军特点考析	64
农村包围城市革命道路理论形成争议考辨	81
中共六大前后中央对“工农武装割据”态度的变化	85
农村包围城市革命道路理论的形成过程	92
农村包围城市革命道路理论的形成时间	102
毛泽东主张在闽浙赣建立根据地的目的	115
遵义会议前中央“三人团”的剖析	120
中央红军长征出发几个问题探讨	136
中央红军出发长征并非“仓猝的出动”	152
中央红军长征出发地与时间考辨	172
中央红军长征初期惨重损失剖析	191
遵义会议召开前中共中央内部斗争的性质	204
论遵义会议成功召开的原因	
——兼驳李德对毛泽东的污蔑	218
正确理解遵义会议改组中共中央领导	238

附：对《正确理解遵义会议改组中共中央领导》 的说明	252
对遵义会议改组中共中央领导表述变化的考析	256
遵义会议决议传达实况探讨	270
关于《(乙)遵义政治局扩大会议》 “传达提纲”考实	278
遵义会议后的中央军事领导小组	290
遵义会议实现中共历史转折的基本经验梳理	307
红军长征出发与结束的时间地点人数	316
对红军长征史若干疑难问题探讨见解指要	319
关于“西北军委”的考辨申明	342
“西北革命军事委员会”实际上是中央的军委	361
“后方司令部”并非实体组织	372
八路军“前方总部”考辨	380
八路军留守兵团成立时间考实	391
抗战后期和解放战争时期中央军委参谋部 仍然存在	400
关于五个争议问题“表述”的建议	413
附 录：	
关于全军“红军团”宣传和认定的问题与建议	416
红军长征史研究尚需进一步深入和提高	423
新中国成立后中央军事领导体制演变探讨	438

中国工农红军创建史疑难问题考辨

中国共产党绝对领导的、区别于其他军队的中国新型人民军队——中国工农红军,是如何创建出来的?有什么历史经验教训?纪念建军 80 周年,回顾红军创建史,必将有益于加深对人民军队建军原则制度的理解,提高在新的历史时期坚持人民军队光荣传统,保证我军永不变质的自觉性。笔者曾在《中国红军发展史》、《中国红军史考评》等著作内,进行过考证论述。针对近十年参与审查全军《历史资料丛书》遇到的疑难问题,经查阅文献史料,深入探讨研究,对红军创建史几个深层次问题谈些见解,愿听取批评指正。

一、为什么说南昌起义并没有“产生红军” 而只是产生了“红军的萌芽”

这种观点并非建国以后才有,而是 1933 年确定“八一”为建军节时的讲法。笔者曾有数篇专题详述,概括起来,可以从三个方面来理解。

1. 南昌起义后至党的六大时的看法。党中央和主要领导人

曾多次讲过,主要有:(1)1927年9月15日《中央政治报告》称,“以农民为暴动的主力,只有如此,然后才能使叶、贺的军队更加改变其性质,更成为革命的军队。”此前于8月中旬党中央决议即明确提出“必须要创造新的革命军队。革命的经验已经证明雇佣军队决不是革命的靠得住的工具”^①。(2)1927年10月9日《张国焘报告》称“此次潮汕可痛之失败”,“十一军尚不能说是C. P. 军或工农军……二十军只(能)说是表同情于我们之旧式军”。同月《李立三报告——‘八一’革命之经过与教训》称,“前委变成了革命委员会的党团。……前委本身组织非常之弱,在政治上,几乎完全失掉了领导。”“军部在组织上是独立的,就是一切政治的指导都须完全经过军部。”^②(3)10月《中央最近政治状况报告》称,“叶贺军队的本身仍旧是旧式的雇佣军队,不加入工农分子使之改组,是不能担负革命任务到底的。”指出“叶贺军队打进广东去,与农民军汇合,同时改造成工农革命军。”^③(4)10月24日《中央通告第十三号——为叶贺失败事件》称,“南昌暴动军”“还非工农贫民的军队”,“革命的基础力量始终并不是叶贺的部队,而是工农群众”。“叶贺所余军队自身要改组变成工农革命军”。“我们主观上的错误……没有在群众之中去创造真正自己的军队。”“民众的武装暴动……才能产生真正的工农革命军”^④。(5)中共六大(1928年7月)周恩来作军事报告称,“严格说,南昌暴动不能算是工农武装暴动”,“虽然党做主要的领导,军队不能完全受指挥,如贺龙部队,事实上成军事指挥协商态度,从各军师到各部,行动不一致的,对指挥机关的命令和办法,执行起来时常改变。”“整个军队未经改编”。“制度仍是雇佣,叶挺军的残部,仍用旧制(教导团较好),这证明没有建立红军之认识。”“红军之建立与工作,由游击队之扩大,即变成红军之组织。”刘伯承报告称,南昌起义“我军内大半非同志领导,而无政治认识的部队”,“我们想以农

军补充革命军兵员的计划毫无成绩,自然是时间太短。”^⑤以上讲法今天审视,显然存在片面性。但足以说明,无论当时六大前后的党中央,还是南昌起义主要领导人周恩来等,均承认南昌起义军由于尚未建立起中共的绝对(完全)领导,仍然打着国民党左派的旗帜,对部队未能认真改造,仍然采取北伐军的一些规章制度等,还不是“真正的工农革命军队”。

2. 确定“八一”为红军建军节时的讲法。查阅1933年6月至8月瑞金出版的《红色中华》报道,可以清楚看到对讲南昌暴动“产生了”红军的更正与理由。(1)认为“八一”“诞生了”、“产生了”红军。如1933年6月25日,中共中央决议称,“今年‘八一’反战日’适为红军成立纪念”。7月14日,中共中央《告红色战士书》称,“今年的八一节……全中国工农红军创立的纪念节”^⑥。中共中央局宣传部7月1日发出“宣传大纲”称,“南昌暴动产生了中国工农红军”。7月2日发布标语口号称,“‘八一’……是工农群众在南昌暴动,成立工农红军的纪念日”。《红色中华》于7月29日刊文称,“六年前的‘八一’,从土地革命花蕾的怒放中,诞生了红军”^⑦。6月30日由代主席项英签发的中革军委命令,“决定‘八一’,为中国工农红军成立纪念日”,“自一九三三年起每年八一为中国工农红军成立纪念日。”^⑧(2)“认为南昌暴动产生了……红军的萌芽”,“还没有正式成立红军”。如1933年7月11日,中央政府主席毛泽东等签发《关于“八一”纪念运动的决议》称,“中国工农红军即由南昌暴动开始,逐渐在斗争中生长起来”,“批准……规定以每年‘八一’为中国工农红军纪念日。”7月17日,中共中央局宣传部又发出对“宣传大纲”的更正声明,称“南昌暴动还没有正式成立红军,但暴动的武装到井冈山以后,变成正式红军的基础。……‘南昌暴动产生了中国工农红军’这是错误的,应当更正为‘南昌暴动,产生中国工农红军的萌芽。’”^⑨7月29日,曾

任南昌起义参谋团秘书长的李一氓著文称,“南昌暴动是奠定了工农红军的基础”,“红军的萌芽,就在这一艰苦残酷的风雨中出土的”。“‘八一’,是中国工农红军的创立的伟大的开始。”同一天,何长工著文《井冈山斗争与中国工农红军的创造》,称朱毛会师井冈山“始正式改编为中国工农红军第四军”^⑩。(3)对比上述两种讲法,可明显看出其不同。最后肯定的讲法,认为“红军即由南昌暴动开始,逐渐在斗争中生长起来”。此前朱德在《怎样创造铁的红军》中称,“中国红军是在土地革命发展和深入的过程中生长和壮大起来的。……逐渐把游击队转成为红军。”^⑪1929年6月中共六届二中全会决议称,“在游击战争中建立工农革命的红军”。1930年冬,党中央制定的《红军政治工作暂时条例》“总纲”称,“中国工农红军生长于农民土地革命和游击战争”。1931年8月党中央《红军问题决议草案》称,“中国各部零散的工农游击队在中国共产党领导之下,已经创造了中国工农的红军。”^⑫正是以这些共识为根据,1933年7月11日,以毛泽东为主席的中央政府在批准以“八一”为建军节时指明,中国红军是从南昌起义开始、逐渐在斗争中产生的,并非南昌起义立即产生了红军。

3. 新中国成立以后主要领导人的讲法。其一,周恩来1957年亲笔修改的《八一起义》说明稿称,朱德率南昌起义军和湘南农军“在井冈山和毛主席的部队会师。这一历史性的会师在毛主席和朱总司令的亲自领导下,奠定了中国[武装]革命的基础,抚育了第一支真正能代表人民的军队——工农红军,就是今天强大的中国人民解放军的前身。”^⑬其二,朱德在《光荣伟大的三十年》中称,南昌起义“这支起义部队中保存下来的一小部分,后来就成为中国工农红军(中国人民解放军的前身)的最初来源之一。”“都成了中国工农红军的最初的组成部分。”“南昌起义起,直至一九二九年十二月红军第四军第九次党代表大会举行为止这段时期,可

以说是中国人民解放军的创建时期。在这段时期中,最重要的成就是毛泽东领导的一支工农革命武装在井冈山地区所创造的经验。”^⑭其三,贺龙 1951 年在《回忆八一南昌起义》中称,“在这些起义中所产生的军队,就组成了最早的中国工农红军。”“南昌起义的部队大部分遭受损失,仅留了一部分力量与毛主席所领导的秋收起义的工农武装在井冈山会师,才正式成立了中国工农红军。”^⑮其四,《聂荣臻回忆录》称,“参加起义的部队没有得到休息,更主要的是没有把部队加以整顿。因为有些部队还不可靠,有些是勉强拉过来的,都应该认真整顿。”“只要我们警惕,适当调整一下干部或调换一些部队,改变部队的组成,在党员中进行周密的布置,也是可以掌握的。可是,起义胜利后,没有及时整顿,也没有调整干部。”^⑯其五,陈毅称“八一起义的教训……说明封建性的旧军队,如果不加强政治工作,不加强党的领导,不脱胎换骨,是不能成为革命武装的。”^⑰

综上所述充分说明,1927 年 8 月 1 日由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南昌起义,是党独立领导革命武装斗争的开始,是党独立领导创建新型人民军队的开端,是党领导探索中国特色革命道路的起点。南昌起义军是与北伐军不同的革命军队,但还不是中共绝对领导下的新型人民军队。南昌起义还没有产生中国红军,但南昌起义军余部成为红军主要来源之一,是成立正式红军的主要组成部分之一。历史地审视,毛泽东领导的湘赣边界秋收起义创建了第一支工农革命军;向井冈山进军,进行“三湾改编”,从政治上组织上奠定了新型人民军队的基础,开始建立中共对人民军队绝对领导的根本原则制度,开辟了第一个农村革命根据地;朱德率南昌起义军余部和湘南起义农军到井冈山同毛泽东部会师,成立了全国第一支正式红军。与此同时,经过湘、鄂、赣、粤等地秋收起义和广州起义,在中共中央八七会议后党中央统一领导和部署下,全

党奋起,共创新军。在农村土地革命游击战争中,产生了各地红军,至1929年12月红四军古田会议决议产生,标志着全党创建新型人民军队任务的完成。

二、“党对军队绝对领导”的原则、制度是 何时提出,如何建立起来的

回顾新型人民军队的创建,虽然毛泽东领导的工农革命军一师一团经“三湾改编”,最早建立起中共对军队绝对领导的基本制度,但是实行党的“绝对领导权”,却是党中央最早提出的、广东省委最早对部队提出要求,江西省委最早明确要求连队建立党支部。可以从如下几个方面深入探讨。

1. 南昌起义军并未能建立起中共的绝对领导权。当时党中央曾明确提出“保证本党绝对领导权”,前委“指挥前敌一切事宜”。深刻认识大革命失败惨痛教训的党中央领导集体,通过八七会议已经觉悟到全党非抓军事不可,“枪杆子里面出政权”,决心领导全党全国革命人民武装反抗新军阀国民党的反动统治,在农村进行土地革命,创建真正的工农革命军队。1927年8月4日,《中央致广东省委信》称,“决令粤省委即刻以全力在东江接应。中央组织前敌委员会,指挥前敌一切事宜,以恩来、立三、代英、彭湃四人组织之,请设法与之互通声气以便进行。我们军事的成败在此一举。”但同时指示“旗子仍用国民党”^⑧。“指挥前敌一切”,显然是要求实行中共对南昌起义军的完全的绝对的领导。10月初潮汕失败后,党中央给南方局暨广东省委的信提出,“叶贺军应与农民军合起,直奔广州”,“如取得广州……选出中国临时革命政府”,“设一常务委员会(应选进仲甫、兆征、恩来等主要

干部),此处可略加沫若及其他左派分子,以保证本党绝对领导权为原则。”^⑨但事实上,南昌起义后立即挥师南征,时间紧迫,来不及对起义各部队认真进行如“三湾改编”那样彻底整顿改造。由于缺乏配套的组织措施,以周恩来为书记的中央前委难以做到“指挥一切”,起义军“不能完全受指挥”。10月24日,党中央总结失败教训就认识到,“军队还非工农贫民的军队”,要求“叶贺所余军队自身要改组变成工农革命军”。强调民众武装暴动“才能产生真正的工农革命军”,“党的作用高于一切,必须有党的指导,……政治指导集中于党是非常之重要”^⑩。但并没认识、也不懂得从组织上如何建立起党对军队的绝对领导制度。张太雷认为“此间党已失重心,各干各的”。李立三认为“前委变成了革命委员会的党团。……军部在组织上是独立的,就是一切政治的指导都须完全经过军部,同时军委亦很弱,所以党的政治的方针很难深入到军队中的同志去。”刘伯承认为“处理紧要事件不完全是前委开会决定的,党的纪律亦甚松懈,统系不明,权力不聚,责任不专,已失掉了领导暴动的重心。”“我们的党,无论何时要有精密的组织,威严的权力,才能确实领导一切。”^⑪这些对中央前委未能“指挥一切”原因的分析,均很客观中肯。这说明党对南昌起义军并未能建立起完全的绝对的领导制度。

2. 最早明确提出党对军队绝对领导原则的是广东省委。由于9月底亲自到汕头了解到中央前委领导内情和南昌起义军状况,以张太雷为书记的广东省委,在全党率先认识到——也是最早正确理解党中央要求中央前委“指挥前敌一切事宜”精神而加以发挥的省委。早在9月22日,广东省委在《目前起义策略》通告中就提出,“在工农军中加强政治工作,必须使其完全在我们党的领导之下。”(早在毛泽东领导“三湾改编”之前)10月15日,广东省委针对南昌起义军失败的事实,在通告中提出,“二十五师及

二十四师……此等武装势力,表面上均受革命委员会参谋团指挥,实际绝对受本党南方局指挥”,即指由“中央前敌委员会”改组成立的“中央南方局军事委员会”绝对领导和指挥。同日,张太雷在南方局和广东省委联席会议作报告时亦提出,“军队一律改工农革命军,指挥在参谋团,实则直接受南方局指挥,不致再成为单纯军事投机行动,旗帜改红旗。”^②但未提出如何落实党的绝对领导原则。

3. 最早明文规定“各连设支部”的是江西省委。显然毛泽东领导“三湾改编”的情况,经过莲花县委已为接任省委书记的陈潭秋等所了解。1927年12月的《江西省委军事部工作计划》指出,“工农军中,党代表及政治工作,应占极重要的位置,各级军部,均须设党代表一人,指挥各该部党的工作,并督促各该部执行党的一切决议。”“工农革命军……其一切指挥须绝对属于党”。明确规定“师为单位,以三人或五人组织师委,师委之下,每团以三人组织干事会,团以下各连设支部”^③。强调“一切指挥”须绝对属于党,并规定师、团成立党委,支部建在连,在全党这是最早的正确文字表述。

4. 最早开始建立党对军队绝对领导根本制度的是毛泽东领导的“三湾改编”。1927年9月29日,在江西省莲花县三湾村,毛泽东主持对工农革命军第一师余部,进行认真整顿。缩编为第一团,辖第一营、第三营及特务、军官、机枪、辎重、卫生各连,共700余人。把中共党支部建在每个连队,营、团成立党委,排或班成立党小组,统一由毛泽东为书记的中共前敌委员会领导;在团、营、连各级设立中共的党代表,开始实行军、政干部同为部队首长的“两长制”,破除了军事长官个人说了算的“一长制”;此外破除旧的带兵方法,实行军内民主制度,成立士兵委员会;生活上官兵平等,取消薪饷制,开始改变雇佣军队制度等。由于团、营、连各级

党委、支部成为部队统一领导和团结的核心,由党代表担任党委或支部书记;由于军事、政治、供给、民众等重要问题均须经过党委、支部集体讨论决定,而后分别由军、政干部执行,由此从组织上建立起中共对人民军队的绝对领导的根本原则和制度,保证部队掌握在忠诚于党和革命的可靠人手中。虽然当时并未留下文字记载,但党史军史界早就公认,人民军队建军最根本的、也是新型人民军队最“新”的原则制度——党对军队绝对领导,是从“三湾改编”开始实行的。因此讲,“三湾改编”从政治上、组织上奠定了新型人民军队的基础。笔者曾著专文进行过较具体的论述,可资参考。^④

毛泽东最早讲党对军队的绝对领导,是1929年6月《给林彪的信》。称“党的领导权在四军里至今还不能绝对建立起来”。“至于二、四团……他们是绝对的党领导。”^⑤

综上所述可以说明,党对人民军队绝对领导根本原则制度的创立,从前只讲毛泽东个人作用显然不够全面客观,理应是在党中央统一领导下,通过全党实践探索,集中全党智慧才创造出来的;但又应肯定,最早从实践斗争中解决这一问题的,确实是毛泽东领导的“三湾改编”。

三、为什么不称中国工农红军是 中国共产党的“党军”

国共合作开办黄埔军校后,1924年11月11日,孙中山提出组织党军。1925年4月,以黄埔军校领导的第一、二团,组成国民党党军第一旅,后扩编为党军第一师。8月26日,又扩编为国民革命军第一军,主要是指该军忠诚于国民党、孙中山的革命理想。

大革命失败后,中共领导创建新的革命军队阶段,党内亦曾出现“党军”的称谓。如1928年10月《湖北省委秋收斗争计划》批语指出,在“鄂中、黄安等区多半是几个党军(单纯是几名党员参加,并直接受党指挥,无以名之,故曰党军)的单纯烧杀行为。”^⑥1929年9月底,陈毅到上海向党中央汇报红四军情况时,提出“缺点:A.造成党军的错误倾向。”中央给红四军的“九月来信”,明确指出“红军由前委指挥,对外用军部、政治部号召,目前是可以的,但到了各苏维埃区域扩大时,则必须召集各地苏维埃代表会成立几省边境苏维埃政权,公开指挥红军,免除党军的毛病,更可以使群众认识红军是自己的阶级军队。”^⑦显然,这时党中央和朱毛红军均反对将红军变成中共的“党军”。

但从1937年春起,正在进行国共谈判,中共准备同意将红军改编为国民革命军。各主力红军领导人在党内提出“创造模范的党军”。如1937年2月19日,在中共中央向国民党三中全会提出“五项要求与四项保证”后,红一军团左权、聂荣臻、陈光、邓小平在《我们的意见》中明确提出,我军“在共产党唯一领导下”,“百倍的巩固共产党在红军中的领导,为创造模范的党军而奋斗。红军(不管将来改什么名称)必须在共产党的绝对领导之下。”5月,中共红一军团党代表大会工作报告称,“怎样使红军成为党军?……才能成为真正党军”。4月,《红二方面军二月份支部工作总结》称,“实现建立我们为模范党军的要求”^⑧。8月25日,中共中央军委在红军改编为八路军的命令中提出,改编后“必须加强党的领导,保持和发扬十年斗争的光荣传统,坚决执行党中央与军委会的命令,保证红军在改编后成为共产党的党军,为党的路线及政策而奋斗,完成中国革命之伟大使命。”^⑨但此后,中共中央、中央军委及八路军总部等,再未使用过“党军”的称谓。对其缘由,笔者见解如下: